

日本干涉活动催生 北京政变

□ 王旭

弃满洲，提拔陆军少将林弥三吉就任我北京公使馆武官，对其密授使命，使其临机措置。第二次直奉战争胜负变化，以常胜军自夸的吴佩孚一败涂地，张作霖得保全其地位，全在于元帅的暗筹默算。”^{[7]28}

林武官具体的如何完成任务，尚不明了，同样的在上原传记中有，“冯玉祥断然决定从内部呼应奉军，是由于林少将的奇策妙筹极好地策动



了冯玉祥，因此冯的态度发生转折性的变化”^{[7]29}。而且从林弥三吉少将本人如下的叙述中能看到是怎样的活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如我方所想，第一，为了防止外国势力进入我国防重要根据地满洲，第二，为了维护我满蒙既得利益，而采取措施，由于我国文武两方面驻外机构的合作，巧妙高明地达到了目的。”^{[8]61} 另外，作为外务省驻外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项工作的证据是：“直军败退，最后胜利归于奉军，当时驻北京全权公使芳泽谦吉立即赶来，对林弥三吉少将说‘妙！妙！’祝贺其成功。”^{[7]28} 却说冯玉祥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入日本外务省是前述10月23日的傍晚。当天阁僚们正出席在永田町首相官邸从下午五点半召开的关西实业家招待会。外务省给临席的币原外相打来电话说，冯玉祥的军队进入北京，接着吴佩孚的军队从天津方面撤退^{[9]102}。

于是币原外相请求加藤首相，在招待会终了后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宇垣陆相因病未出席招待会，也赶来参加内阁会议。推测宇垣陆相或许在府中暗中等待政变消息的传来。在内阁会议中，币原外相报告了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在阁僚各位的关照下，因此政变可不必担心满洲遭受战祸。此前还主张援助张作霖的高桥是清农商务相，大喜道：“因为你的努力，日本得救了。如果像我们主张的那样，秘密援助张作霖，会陷入困境，不

1924年10月中旬，直奉间的战斗仍未见胜负，处于对峙中。10月11日，吴佩孚亲自督战山海关，意在统一各军击溃奉军，但第二军司令王怀庆、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所部按兵不动，战争仍徘徊在山海关一带。吴佩孚命令王怀庆、冯玉祥火速进军从侧面牵制奉军，但两位司令不听从调遣，战局开始对直军不利。因此，吴佩孚于10月18日向大总统曹锟报告称 暂行总退却，以试探王、冯之真意，据情势可免去王、冯两司令，再图后策。对此曹锟同军事处长陆锦审议后答称 无此必要，应彻底击溃奉军。吴接此答复后愤然采取攻势，计划突破奉军防守，然未能立刻挽回颓势。

另一方面冯玉祥、王怀庆观望战局变化，同驻热河的米镇标、驻通州的陕西军第一师长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等暗中策划，乘直军陷于不利战局之机，采取行动反对吴的武力统一政策。所以，冯玉祥于10月22日傍晚自热河向北京返回，夜间于北京郊外的北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政变方针。第二天即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队陆续开入北京，控制交通、通信机关，囚禁曹锟，发布停战令，免去吴佩孚的职务。局面由此一新。

由于冯玉祥政变，吴佩孚自天津撤退，从海路逃至烟台，使日本朝野上下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感到担心的“在满权益的保持”得以贯彻。

却说当时推测冯政变的原因是“由于吴仰仗实力冷遇王、冯的私怨”^{[10]43}，但在幕后，和军部中央保持联系的日本驻外军事机构暗中参与了政变活动，外务省机构对这种幕后活动也表示了默许。

据与幕后活动有关系者的回忆资料，勾勒活动概貌如下。

首先，最初的活动者，是当时的预备役陆军大佐、住友合资会社的顾问寺西秀武。时在日本的寺西1924年秋来到东京，察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形势变动后，遂闯入位于银座的大仓组，利用该社的密码电报，通过大仓组天津支店向段祺瑞发电敦其立即参加战争。然后直奔奉天。在来华途中的车上，寺西遇见了奉军第六军副军长吴光新，遂随同其一起访问了张作霖，劝说张同段合作。寺西马上又跑到天津，拟指使冯倒戈的计划。当时段在天津租界，“政变费用由段写信向张申请，在天津领取”^{[12]807}。

“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僵持之际，段一再向张提议，用一百万日元能收买冯、胡和孙，出钱就能扳倒吴。”^{[12]800} 这是不是寺西劝说的作用不详，听到这种提议的张作霖顾问松井七

夫大佐，“因为张出钱不痛快，和杨宇霆商量后，某一天跟随阪东末三顾问，在密室访问了张，同其畅谈说‘花百万日元取得战争胜利，没有这样的便宜事，如果不能成功，就当百万日元打水漂儿了，不好吗’，这样张也勉强同意了”。因为张希望这笔钱由日本人送到，杨劝说也不改变主意，当天遂决定由日本人出钱，由松井送到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处。由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长天野悌二通过吉冈司令官再由段交给冯^{[13]1}。将百万日元直接送到冯玉祥处的是冯的军事顾问松室孝良少佐和王乃模、段祺树三人^[14]。

但在冯玉祥侧直接推动其发动政变的却是土肥原贤二中佐^{[4]82}。而土肥原是由坂西利八郎中将推荐，同坂西中将一同于1924年9月担任中国大总统府军事顾问的。由于参谋本部对土肥原的意见是暂以正式应聘处理，供职参谋本部在中国工作^[15]，故土肥原同坂西的关系极亲密。时有情报传到阪西处：“当时大总统曹锟为保其地位由秘书长王兰亭、顾维钧等策划请求美国援助。”“而且抄写了作为证据的文件，但因为文件出处写错，所以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对日本来说是重大问题，土肥原将此文件给黄郛看，敦促其打乱计划。”“此时锐意革新的黄郛决定劝说冯玉祥使其谋反，下决心采取打垮曹锟的手段。”作为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的黄郛“将此文件提到内阁会议上，会议一结束马上奔高丽宫冯的住处敦促其崛起。据说冯也犹豫不决，黄有一天晚上在冯处住下劝说冯并拟定了攻入北京城时张贴的告示草案，在印好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才坐车返回北京”。据说由于黄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行事，当曹锟感到异常时已经是政变那天早晨即10月23日上午九点左右^{[4]82}。

再有，日本驻中国现地军事机关参与这个政变计划，军部上层应该是知晓的。宇垣陆相也好，上原元帅也好，不仅知晓，而且据说还鼓励完成这种活动。在宇垣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日本以自重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观望当前形势的推移伺机进行调停。那是为了在双方均势未完全打破前，使日本在满洲的立场更加巩固，所以对现在的权力者张作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当的支持（两军在山海关对峙初期的感情）。在以上的考虑下，政治家、实业家、政党等也在活动，在决战之际背地里给予相当支持的结果是其后局面的展开。……”^{[16]2}

而且上原传记中有如下记载：“……元帅从国防国策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不应该断然放

民间古代“法医”——仵作

□ 王明忠

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乾祐年间(948—950)。仵作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职业,有些仵工因官府验尸的需要被聘入官府供职,成了府衙内的差役,称之为“仵作行人”或“仵作”或“行人”^[1],这种“官制仵作”的称谓在宋代的《洗冤集录》及其前后众多的法医、侦查、审判的著作中都有记录。据《洗冤集录》所载,仵作参与检尸的主要任务是搬运、清洗尸体和在验尸官指令下向在场群众报告损伤状况。仵作《辞海》中释为: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检验刑伤之人。《清公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清《六部成语注解·刑部》:“仵作,验尸之男役也。”以上均指的是“官制仵作”。“民间仵作”极少见诸文字。

从仵作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仵作的发展一直是有两条线,一条是官府中的“官制仵作”,另一条是“民间仵作”,可以将“官制仵作”看做“民间仵作”的一条支线。1907年《大清新刑律》的相关规定结束了沿袭千余年的“官制仵作”“验尸”历史^[2]。但这也只是结束了在官衙中任职的“仵作”的历史使命。“民间仵作”却从未消失过,他们一直活跃在中国人十分敬畏的丧葬习俗之中,直至现在,很多地方仍然活跃着仵作的身影。由于“官制仵作”的验尸、查伤、“民间仵作”的处理丧葬事宜,都与尸体密切相关,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仵作与法医画了等号,并将对尸体的敬畏、恐惧、恶心的认知顺其自然地就转移到了“仵作”的身上。

民间中的仵作,其实就是搬运尸体的工人,所以也称为“仵工”、“仵作佬”,这与受征入府当衙役的仵作是两回事。民间中的仵工的工作十分繁多。尸体的整个处理过程都由仵工来完成。一般来说,由于受“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仵工对尸体都是十分尊重的,因为他们也相信人有来世,有轮回报应。尸体的整个处理过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也不尽相同。

在岭南丧葬民俗中“大殓”俗称“入棺”。

大殓宜先择定吉日。古时有三日入殓分礼法。三日而后殓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至今民间仍沿此俗。通常三日,早的有一日,迟的有五、七日。这与天气冷热和择日有关。大殓有专习此业的仵工,善理尸体事宜。给死者按闭眼、给死者穿衣;“钓金鱼”;“死在夫前一枝花”;“分梳”;“扯富”;“送苦”等,这些习俗,仵工已是烂熟于心、轻车熟路。丧家在处理丧事时对仵工也是多有倚重。

在旧时绍兴丧葬礼仪繁琐,死者入棺时,须由长子捧头,幼子抬脚,仵工以广藤或竹篾提举遗体腰部,抬放入棺。仵作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原本也应受人尊敬,但当仵作的这双手,什么男尸女尸都得验,朽骨烂肠都得摸,当年根本就没有什么胶皮手套之类可以隔绝肮脏腥臭,因此仵作出门,连街上的狗都会因为闻到异味而冲他的那双手“汪汪”几声。仵作干的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被认为是“贱役”中的“贱役”,官府衙门、幕僚属吏、市井百姓对仵作是明敬暗鄙,“哪怕是穷得当掉了裤子,也不屑于来抢仵作的这碗饭吃的”。更有一些“仵作”利用丧家处理丧事的特殊心理强取豪夺,也使得本就不好的名声更让人鄙夷。

明代天津由于丧礼逐渐奢靡起来,从事“白事”的仵工、扛具、吹手和扎纸人的,他们都按照各自所在区域,划分疆界,遇到哪家有丧事,不论贫富,都要去勒索,抬高价钱。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找碴儿滋事。富贵人家倒还好说,贫苦人家,一旦家中有了丧事,活人都难以维生,丧礼更无从应付。久而久之,操纵丧礼的这些行业成了天津城的公害。奢靡之风日盛,仵作大赚其钱,百姓苦不堪言。

这种陋俗从明朝到清初愈演愈烈,以至于官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规定“凡遇有丧之家所需仵作、扛具及吹手、纸扎等项,毋论是



何地方,务要听从民便,不许仍前把持,恣意刁措”,违者将重罚。但谁家有个“白事”,依然少不了这些仵工们。而且,愈到清后期,天津丧礼的奢靡之风愈烈。就连一些贫苦人家办起丧礼来,也是狠下血本,弄得景象跟大户人家差不多。仵工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在粤港等地有俗语云:三行佬的口,仵作佬的手。你不会是我的敌手!来比喻一个人的口舌利索、骂人的本事大,身体强壮、打架的功夫强,可见由于仵作动手检验尸体的现实,人们将其与暴戾之气结合了起来。在我国潮汕地区,女人骂孩子“脚手多”,乱动东西,说是“仵作脚手”,这是由于仵作在检验尸体时需要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察看尸体,仵工脚手自然也就不能消停了。同时也说明仵工这一行业在民间的广泛存在,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从事者多为男性,仵工似乎专指男性仵工。

在中国古代由于中国人对性别的敏感,“男女授受不亲”,对待命案现场的女性尸体一般由稳婆来进行检验。稳婆主要从事民间接生,或受衙门支配内廷选奶口,或协助选妃等事务。由稳婆协助检验女尸,当然就属于官衙的事情了。实际上稳婆从事的检验女尸的工作就是仵作的工作范围,只不过对象的性别有别罢了。

由于“仵作”从事的都是般人不屑一顾的处理尸体的工作,常人怕沾染暴戾之气,常常是避而远之,加之从事“仵作”工作的人员文化水平很低,仵工的存在迎合了一些农村地区的落后习俗,所以村民只要有人家办丧事,都会找仵工。有时候,在比较危险的地方如河里、山崖下有尸体的话,村里人也通知仵工去收尸。久而久之,仵工成了不可或缺的另类人物。有的人则认为“仵作”身上煞气重,可以驱鬼避邪。一些非常顽皮和经常得病的孩子的父母竟带着孩子认“仵作”做干爹,觉得这样就可以沾上“煞气”,一可以镇邪气,二可以驱病魔消灾。这种习俗与中国特有的禁忌相适应。

由于仵工这种行业的垄断,加之国人对死者的尊重,民间素有购买丧葬用品不得讲价的习俗,使得仵工借丧葬之名,行索

能面对各国,我们将陷入进退两难……”希望同币原外相和解^[3]。不过,通过此番言论不能了解政变是军部机构策划的。

参考文献

[1]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会:吴佩孚先生集(下篇)[M].

[2]对华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续对华回顾录(下卷“寺西秀武”项)[M].

[3]松室孝良氏同笔者的谈话.

[4]对华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续对华回顾录(下卷“坂西利八郎”项)[M].

[5]防卫厅战史室:密大日记(大正十三年第三册)[M].

[6]宇垣一成:宇垣日记[M].

[7]元帥上原勇作传记编纂委员会:元帥上原勇作传(下)[M].

[8]林弥三吉:文武权力的界限及其运用[M].

[9]大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M].

★本文译自[日]栗原健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东京:原书房,1981年版,第217—221页。

★作者王旭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博士生。